

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

吴志成 徐信高

【内容提要】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欠缺代表性和包容性,不公正不合理不适应的内容越来越多,全球治理赤字更加突显,削弱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也构成严峻挑战。中国倡导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不仅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了全球治理的前进方向,也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展现了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和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推动发展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必须坚持各国主权平等,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全球均衡普惠发展,尊重多元文明与发展差异。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重要贡献者和部分领域的引领者,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提供了价值指引;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凝聚合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树立成功典范;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夯实国家基础,充分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重要担当。

【关键词】 全球治理;公正合理;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北京 邮编:100091);徐信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天津 邮编:300350)。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 (2024) 04-0003-26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文中附编由笔者负责。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① 伴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全球性风险挑战更加复杂严峻，全球治理赤字进一步加重，全球治理体系也进入深刻变革期，“全球治理向何处去”以及“中国应该怎么办”成为亟待回答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历史发展大潮流和时代发展大趋势，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供方向指引，充分彰显了中国的负责任大国担当。

一 公正合理的重要内涵

公正合理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基本价值，其内涵十分丰富。所谓公正，即公平正直，无偏私。所谓合理，是指合乎道理或事理。就此而言，公正与合理均涉及价值判断，内含了特定的价值标准。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标准体现为当时的法律要求。但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公正合理的判定标准体现在对公共性与平等性、差异性与变革性等原则的理解与尊重上。公正合理是生活世界的指导原则，体现了人类对一种善治社会愿景的期待。数千年来，促进人类社会实现公正合理不仅是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实践目标，也是中外圣贤哲人思考和探索的理论命题。

（一）以公共为目标追求

公正合理在目标追求上指向公共无私。在中文语境下，“公”与“正”虽常连作一词使用，但其细微含义仍有差别。“公”是“私”的对立而，因此才有“公是个广大无私意”^② 以及“兼覆无私谓之公”^③ 的说法。“正”则多指中正的模范，常指涉国家统治者。孔子提出：“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④ 孟子提出：“君正，莫不正。”^⑤ 这些都是强调当政者应当有正直的品行以作为民众的表率。“公”与“正”二字合并使用时，取“公”的一般含义解释“公正”一词，并与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62 页。

② 《朱子语类》（卷二十六）。

③ 《尚书·道本》。

④ 《论语·颜渊》。

⑤ 《孟子·离娄上》。

“无私”相连，如“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① 无私谓之公正，若统治者有能力“奉三无私”，那么就可以“以劳天下”。^② 这样的社会也将是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③ 的社会。

在英语中“公正”与“正义”含义相同，均使用“justice”一词。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正义长久以来被视为良好政治秩序应具有的基本属性。在柏拉图（Plato）看来，无论是城邦的正义还是个人的正义，其关键都在于“各得其所”“各应其分”，最终指向城邦的完善。^④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进一步认为城邦当以正义为原则，正义树立了社会秩序的基础。在他看来，“最为公正”的政体既不应偏于少数，也不应偏于多数，而应以城邦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⑤ 此外，鉴于正义与法律之间的密切关系，亚里士多德肯定了遵守法律之于正义的价值，因为法律上所要求的行为也是总体上公正的行为。^⑥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为清晰直接的阐释，即“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⑦ 可见，无论公正合理的指涉对象是个体统治者还是政治制度，其在目标追求上都体现为一种公共性，具有公共正义无私的内涵。

（二）以平等为价值期待

平等是公正合理的应有之义。就一般意义而言，平等描述了“一种无差别的结果或状态”，体现在政治层面就是人们在人格、权利、资源和地位等方面具有同等性。^⑧ 在中国古人对公正合理社会的设想中，人人平等是至关重要的面向。早在秦末农民起义中，起义首领就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质疑权力世袭的正当地性。中国人所追求的天下大同社会，其一大标准是“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策，人皆平等”。^⑨ 佛家也提出“众生平等”与“是法平等”的观念，当发现人类本性习惯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经济平等便成为人们的思考重点。这些都突出反映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均平”思想中。^⑩

① 《淮南子·修务训》。

② 《礼记·孔子附记》。

③ 《礼记·礼运》。

④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6页。

⑤ 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157页。

⑥ 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6页。

⑦ 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⑧ 俞可平：《重新思考平等、公平和正义》，载《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第6页。

⑨ 康有为：《大同书》，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14页。

⑩ 李宗桂：《从“均均”看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第34页。

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平等思想源远流长。亚里士多德强调公正包含平等的向度，明确指出“不公正即不平等，公正即平等”，^①开始将平等置于政治分析的关键环节，从而奠定了后世对平等问题的关注与理解。希腊文明晚期，斯多葛学派和犬儒学派尝试超越此前古希腊的狭隘平等观，构想一种人与人之间普遍平等的政治前景。这种普遍平等思想对此后的罗马帝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近代启蒙思想家。当基督教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播，基督教倡导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式宗教平等观逐渐深入人心。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宣扬的“人人生而平等”观念很大程度上即是对这一理念的援引和升华。随着现实境况的发展，“资源平等”“机会平等”“能力平等”等理念近来又开始在西方世界时兴。

（三）以差别为伦理关怀

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对平等存在一种自然的追求，但无差别的平等可能损害社会公正。由于先天或后天等多种因素影响，人类社会存在各类弱势群体，他们在行使权利上有着诸多不便。因此，在制度安排上对弱势群体给予适当照顾符合公正社会的伦理关怀。孟子认为应当对社会中的“鳏寡孤独”展弱势群体予以最优先照顾：“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②这种对弱势群体的体恤关怀反映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及实践中，尤其体现在“恤刑慎杀原则”上。“故宥过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③从汉代开始，年老者和儿童若非犯有大罪，可以免除刑事处罚。唐代法律在此基础上将特定残障情形纳入免刑范围，奠定了老弱病残免受刑罚的制度框架，为后世历朝所沿用。^④

罗尔斯提出“差别原则”，关注一定程度不平等之于公正的价值，这一原则尝试论证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有在符合社会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的情况下才是允许的。^⑤这实际上是指制度安排需要适当照顾社会弱势群体，降低其所受资源、财富或机会分配不公的掣肘，促进其行使权利与获得机会的手段。有学者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拓展至全球层面，提出一种“全球差别原则”。如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认为在一种全球原初状态中，全球差别原则有利于确保全球基本结构的公平运作，提升全球处境最差者的地位。^⑥面对多元时代的群体差异，一种批

①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47页。

② 《孟子·梁惠王下》。

③ 《孔丛子·刑论》。

④ 蔡友伦：《中国古代“老幼妇孺”的刑事法保护及其当代传承》，载《政治与法律》，2023年第8期，第47—53页。

⑤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59—63页。

⑥ 查尔斯·贝茨著，丛德译：《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165页。

判的正义理论提出了“差异政治”思想,提醒人们关注处于受压迫地位和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的政治诉求,进而承认这些群体在公共政策中的特殊权利。^[1]

(四) 以变革为治理原则

就政治意义而言,公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适用于一切时代的公正标准并不存在。^[2]一个时代公正合理的政治制度在另一个时代却可能是不公正的。如果要保持政治制度的持久公正性,这一制度就应当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因此,变革成为公正合理的必要前提。这种以变革求公正合理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周易》认为,“凡益之道,与时偕行”,^[3]强调变通趋时、与时俱进。为了践行“益之道”,就需要一种不断革新的精神。正如《礼记》所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4]这种因时而变的思想对先秦法家学说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法家早期代表,商鞅明确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观点,^[5]彰显了改革变法的坚定决心。在此基础上,韩非子指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6]受法家变法思想熏陶,改革变法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和治国理政的重要特点。

西方历史上也存在丰富的变革思想与实践。古希腊思想家首先意识到并不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政体,政体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中。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认为“一切皆流,无物常住”,^[7]开创朴素辩证法之先河。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中,运动变化成为一种普遍趋势。“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8]而在实践中,为追求一种公正合理的政治生活,改革与革命在西方近代史上不断上演。继尼德兰革命之后,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在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国爆发。这些革命在“天赋人权”“自由博爱”等启蒙思想的指引下,摧毁了传统的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当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断积累与发展时,改革与革命的按钮再次被触动。一方面,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革命,最终演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还有一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改革发展为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暂时得以压制。

[1] 艾利斯·W·杨著,李波子,刘靖子译:《正义与差异政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223页。

[2] 王绍烈:《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22页。

[3] 《周易·益卦·象传》。

[4] 《礼记·大学》。

[5] 《史记·商鞅列传》。

[6] 《韩非子·五蠹》。

[7] 常旭尧:《从“万物流变”能否推出“无物永驻”——赫拉克利特“河流既篇”辨正》,载《哲学动态》,2017年第12期,第6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二 全球治理视角下公正合理的基本要义

“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①而在当下，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各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使得全球治理赤字更加突显，推动发展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全球治理视角下公正合理的基本要义主要包含五方面内容。

第一，坚持各国主权平等。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之间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联合国宪章》的首要原则即强调各会员国主权平等。这一原则要求国际社会不以大小、强弱、贫富为依据将国家划分为三六九等，各国在国际法上享有平等的主体地位。虽然国际法的平等主体地位并没有消弭各国之间由于领土面积、人口和技术等因素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它规定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界限以及权利义务。“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②主权平等的价值还在于，由这一原则衍生的许多重要国际规范——如领土完整、自由贸易、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等——间上权平等原则相互补充、彼此强化，已联动形成一种全球规范网络，指引国际社会各类行为体的行为。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移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中，各国平等参与决策，构成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主权平等因而成为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的基本起点。没有平等的参与主体，遑论全球治理公正。在新形势下，如果主权平等受到挑战，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都将难以保障。

第二，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合作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及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为支柱的多边贸易体制。这一系列制度的创设推动了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总体上维持了世界和平与稳定，制约了大国战争冲动与强权逻辑，其基本精神和合理内核必须得到捍卫与维护。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体系也存在内在局限。首先，少数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39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481 页。

西方发达国家以自身意识形态和国内治理经验为基础设计了战后国际体系，使这一体系带有天然的规范性偏见，容易漠视和排斥其他国家的正当发展需求。其次，冷战时期的阵营对峙和霸权行为对战后国际体系形成挑战，导致这一体系难以有效发挥应有作用，甚至成为一方打压遏制另一方的工具。最后，各国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导致国际格局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中，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及时调整以反映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既有全球治理体系却尚未给予这些国家在国际制度中与其能力与意愿相匹配的代表性与发言权。

第三，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① 全球化时代面临的问题往往具有跨界联动特征，一国所采取的政策也经常产生连锁效应。这种议题特征与政策联系共同决定了面对全球风险挑战时各国无法单打独斗，只有各方平等协商，寻找最大公约数，才能有效促进问题解决。作为一种协调各国达成集体行动的方式，协商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民主性，即以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② 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应将多边协商内化为一种基本的价值理念。一方面，协商是主权平等原则的自然延伸。在当代多边主义框架下，平等与协商联系密切、难以分割，平等构成了协商的基本前提，协商彰显了平等的民主特性。另一方面，协商所具有的民主优势有助于提升全球治理的合法性。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存在民主赤字，持续损害着全球治理的合法性。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各国集体行动破解民主赤字，推动国际关系朝向民主化发展，为全球有效治理提供稳定的合法性支持。此外，真正的多边主义也是反对当代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有效工具。随着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各类多边主义安排和多边主义规范日益成熟和深入人心，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越来越缺乏行动空间和合法性基础。

第四，促进全球均衡普惠发展。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各国人民的生活便利和生活质量得到大幅改善。与此同时，世界贫富差距扩大，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部分发达国家的底层民众沦为全球化的失意者。由此导致的各类“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运动不时冲击全球治理体系，增加了全球治理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提升全球化的普惠性与包容性成为全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61 页。

② 吴志成、刘培东：《促进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9 期，第 29 页。

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原则与目标。发展成果普惠成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内在要求。“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① 一个南北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世界不符合人类的伦理关怀与道德认知，与全球化的正义诉求不相匹配。全球化的非均衡化发展同时削弱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降低了全球治理的实际效能，全球发展应当是全球所有国家、所有人民的发展，只有实现均衡普惠发展，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全球治理才能更加稳定有效。

第五，尊重多元文明与发展差异。世界上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 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的历史、国情、民族与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也存在诸多差异。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应该包容这种多样性和发展差异，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与发展道路。首先，就法律意义而言，主权平等原则意味着所有国家都是国际法的平等主体，都有权利自由选择适合自身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其他国家必须给予充分尊重。其次，尊重多样传统与发展差异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② 百花齐放方能百家争鸣。一方面，多样性的发展道路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多发展范例，丰富人类发展模式。选择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之间学习互鉴，对保持人类发展生机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多样化的发展道路之间展开良性竞争有利于防止某些国家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破坏人类文明和合共生的发展生态。

三 全球治理中的不公正不合理表现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和包容性不够，不公正不合理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这种治理赤字日益加重削弱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成严峻挑战。

（一）全球治理体系主导国的强权霸道行径

作为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创设者和主导国之一，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① 习近平：《共迎时代挑战 共建美好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6日。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475页

建立了以自身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并逐渐将其推广至全球范围。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强权霸道行为、冷战对峙思维和意识形态偏好不断扩散，成为战后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的直接威胁。

一是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横行。冷战后单边主义不时发酵，冲击着地区安全与全球秩序，对全球公正构成极大挑战。在各种单边主义行径中，美式单边主义最为突出，对全球秩序造成严重破坏。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假定既有体系领导国作为守成国，倾向于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并致力于维持国际秩序现状。但从长期以来的国际关系现实看，美国作为体系领导国经常表现出修正主义的一面，在行为模式上强调单边主义、军事手段干涉、意识形态输出和权力扩张。^① 冷战胜利使美国一跃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也助长了其盲目的霸权野心，动辄采取单边行动扰动地区安全局势和国际经济秩序，具体而言体现在三方面：首先，频频挥舞制裁大棒，扰乱国际安全秩序。单方面制裁早已成为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的重要工具。截至2021年，美国推动的累计生效的制裁措施已有9400多项，数量为20年前的近10倍。^② 其次，无视大国应有责任与担当，频繁退出多边协议。在小布什总统任内，美国为护持霸权地位单边发动伊拉克战争、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并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当发现自身制度地位优势受到威胁时，特朗普政府以“退出外交”胁迫他国推进国际制度调整，捍卫自身霸权利益。最后，不断加强军事建设，军事预算屡创新高。2022年美国军事开支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39%，是排名第二国家的三倍有余。^③ 在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美国国防预算高达8580亿美元，也是美国年度国防预算首次超过8000亿美元。^④

二是小圈子小集团思维浓重。全球治理倡导共商共建共享，以实现所有国家的共赢与发展。但一些国家热衷于搞排他性小圈子，严重破坏了全球开放合作。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在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拉拢欧洲盟友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挑起冷战对峙。苏联解体后，美国推动本该寿终正寝的北约多次扩大，强化原苏联东欧地区安全困境，导致乌克兰危机乱局延宕不止。近年来，为遏制中国发展，美国变本加厉在军事、经济和技术等领域打造排华小圈子。在军

① 刘升：《范式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以现实主义为例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202页。

② 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The Treasury 2021 Sanctions Review," <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136/Treasury-2021-sanctions-review.pdf>,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9日。

③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22,"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4/2304_E_n_milex_2022.pdf,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10日。

④ 《军费高企，美国持续搅乱全世界》，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3月21日。

事领域，美国创设和拓展多项竞争性的小多边安全机制。在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并激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后，拜登政府延续这一思路并使之精细化。与此同时，美英两国与澳大利亚签署《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换协议》，成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加上本地区早已存在的“五眼联盟”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联盟体系，美国在亚太地区打造了多个排华性小圈子。在经济领域，推出多项经济战略和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对冲“一带一路”倡议，并借新冠疫情推动全球供应链转移与重组。美国政府推出排斥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在该框架基础上，美国在基础设施领域和供应链问题上也动作频频。随着技术日益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关键要素，美国开始在技术领域筑起“小院高墙”。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上，美国联合其盟友成立“D10俱乐部”，排除华为5G设备及技术以减少对中国通信技术的依赖。面对激烈的芯片之争，美国意图拉拢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 4）”遏制中国高新技术发展。

三是片面渲染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长期被工具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对外政策中经常将其作为维护国家或集团私利的工具。一方面，西方国家持续推动意识形态输出。策划煽动“颜色革命”是美国外交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美国护持其霸权的主要手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苏联地区及中东北非接连发生“颜色革命”，这对相关国家国内政治以及国际秩序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西方国家之所以热衷于煽动“颜色革命”，旨在通过支持特定国家发生“革命”拉拢国际体系的中间游移力量并削弱分化多极化力量，以此巩固其主导地位。^[1]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频频挑起意识形态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苏联展开的意识形态对抗导致美国抱持严重的冷战思维，偏好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并以此构筑竞争性叙事与对抗性集团。意识形态遏制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中的重要手段，并呈现出点到面的全面发展态势。^[2]拜登政府上台后，更加注重以价值观整合盟友，企图以“民主价值观”为纽带，构建具有对抗性质的“民主国家联盟”。2021年12月，美国策划举办所谓“全球民主峰会”，以美式民主标准划分阵营，人为制造对抗性的“文明冲突”。此种意识形态对抗也外溢至一些具体治理领域。例如，为应对新兴国家在数字治理领域不断提升的规则影

[1] 卞维敏、谈家展：《冷战遗留视角下的“颜色革命”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4期，第4页。

[2] 王达：《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升级的实质》，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第148页。

响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数字治理问题泛意识形态化，炮制出所谓“数字民主国家”和“数字威权国家”的对立叙事。^[1]

（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滞后于治理实践

伴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持续演进，全球治理体系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实践。“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变革，但治理滞后仍是突出挑战。”^[2] 现有各种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代表性与公平性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危机，对现有全球治理机制构成巨大挑战。

一是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不足。国际机制有效性反映了特定制度塑造或影响国际行为的程度，是机制存续的关键。但当前国际机制的有效性面临多重挑战。首先，伴随着全球治理机制的增多与扩散，不同机制之间开始出现结构嵌套、功能重叠甚至目标冲突，机制碎片化与机制复杂性问题突显，对治理机制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其次，机制并非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受限于它所存在的“更广泛的背景”。^[3] 一方面，治理机制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良好合作，但当前的地缘冲突与大国博弈加剧了全球信任赤字，恶化了全球治理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现实政治环境；另一方面，面对跨国环境治理、传染疾病流行及网络空间安全等新兴全球性挑战，现有全球治理机制明显滞后，难以及时有效应对。例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不仅未能提供金融风险预警，还无法成功组织有效的国际应对；联合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作为不彰，暴露出现有国际安全机制的不足；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卫生组织无力组织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这些事实都反映出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缺失。

二是全球治理机制的代表性不足。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设计，这些国家拥有更多的议程设定权与投票决定权。“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4] 中国自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多年来一直以高速增长带动全球经济复苏。2013—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1] 任琳、孟思宇：《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5期，第68—69页。

[2] 习近平：《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8日。

[3] 奥兰·扬著，陈玉刚、潘燕译：《世界事务中的治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13页。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479页。

贡献高达 38.6%，远超七国集团贡献率总和的 25.7%，¹ 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引擎。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仍落后于美国与日本，位居第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 20 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80%，过去 40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比从 24% 增至 40% 以上。”² 然而，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却并未显著提升。作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最具影响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二十国集团成员中只有南非一个非洲国家。全球治理机制的代表性不足也反映在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事务的身份地位上。³ 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各类非政府组织已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但现有许多治理机制并未给予这些组织稳定且合法的参与地位。

三是全球治理机制的公平性不足。公平性不足是诸多全球治理机制的重要特征，这一点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安排上尤为明显。首先，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试图促进各国之间的谈判公平，但只有较大的国家才拥有运用这一机制所需要的金融资源与智力支持。其次，世界贸易组织的运作由成员方驱动，许多决策是在封闭或半封闭群体以及邀请制会议中达成的，这就对成员方的技术和外交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后，就准入过程而言，发展中国家作为新成员往往面临高标准的规则制约。⁴ 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对贸易谈判所达成的规则框架产生了负面影响。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轮会议谈判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其与发展中国家不对称的市场实力，置贸易谈判应有的公平协商精神于不顾，威胁达成具有歧视性和排斥性的贸易投资框架。⁵ 由美国主导设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治理机构也未能吸收广大发展中国家全面参与其规则制定，这些国家的正当权益难以获得有效维护。⁶ 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公平性建设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曾有力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公平性，但当前西方国家却企图借“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模糊和弱化这一原则。⁷

1. 徐秀军：《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中国动力》，载《光明日报》，2023年3月13日。

2. 习近平：《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 2023 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报》，2023年8月23日。

3. 卢中英：《动荡中的全球治理体系：机遇与挑战》，载《当代世界》，2019年第4期，第8页。

4. 安德鲁·赫塞尔普，林曦译：《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39 页。

5. 理查德·W·米勒著，杨进等译：《全球化的正义：贫困与权力的伦理学》，江西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15—127 页。

6. 徐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载《学习时报》，2022年3月25日。

7. 黄亮：《“碳中和”背景下的国际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政策选择》，载《外交评论》，2021年第6期，第 137—138 页。

(三) 当今世界发展不平等状况更加突出

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全球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不平等状况。这种不平等尤其体现在收入不平等上，该问题当前已成为影响全球公正治理的重大挑战。“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① 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重点需要实现全球平衡普惠发展。

1. 南北贫富差距依然显著

经济全球化并非生来就具有普惠性，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和占有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②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工业实力和先进技术在全球建立起支配地位，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这种殖民体系下，广大殖民地成为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西方国家不仅借此积累了大量财富，还在全球促成了一种等级化的经济贸易体系。如今，即便这些国家早已获得独立，不平等的经济体系仍然将其固化在一种“依附”地位，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参与者。尽管在全球化背景下产业转移带动的技术扩散有可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机遇，但发达国家基于对先进技术知识产权的垄断依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施加限制。^③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红利主要被处于中心地区的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虽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程度，但非洲极端贫困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仍然进一步扩大。^④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进步在南北国家之间可能产生不对称影响。当下正在兴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降低发展中国家在低成本劳动力上的竞争优势，导致全球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陷入困境。^⑤

2. 各国内部贫富悬殊持续扩大

国家间贫富差距只是世界贫富差距的一个侧面，各国内部贫富差距同样值得关注。有数据显示，国家内部收入最高的前10%人群同底层的50%人群之间的收入差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479页。

② 吴志成：《经济全球化演进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的担当作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6期，第18页。

③ 吴志成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外部风险、挑战与应对”专题笔谈》，载《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第54页。

④ World Inequality Lab,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2,” <https://wid.world/news-article/world-inequality-report-2022/>,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5日。

⑤ 克劳斯·康佩尔著，李青译：《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

距从 20 年前的 8.5 倍已扩大到如今的 15 倍，几乎翻了一番。^[1] 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经过长时段历史考察也发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各国不平等程度显著加深。以美国为例，美国最富有 10% 人群的收入比重由 20 世纪 70 年代的 30%—35% 上升至 21 世纪初的 45%—50%。^[2] 联合国发布的《2020 年世界社会报告》显示，在过去 30 多年里，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都在趋向恶化，并且由于技术创新等因素的外溢效应可能加剧这一趋势。^[3] 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源自资本的逐利性。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环境下，资本相较于劳动者的便利流动性有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廉价的投资场所，资本流出国的劳动者则成为牺牲者。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不断兴起的民粹主义以及逆全球化即是明证。与此同时，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不断提高工业水平的智能化程度，许多工作开始被机器替代。在这一过程中，那些从事流水线工作和常规性劳动的低收入人群更有可能被取代，高技能人群的相对需求反而得以提高，由此导致本就悬殊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3. 不平等的发展样态复杂多元

收入不平等长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性别和数字技术发展等不平等的问题常常被忽视。性别不平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成立后设立了妇女地位委员会，旨在促进性别平等，提高妇女地位。此后，《世界人权宣言》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出台以及全球女权运动的兴起进一步提升了国际社会对性别平等问题的重视。虽然国际社会付出了诸多努力，但世界范围内的性别不平等依然突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项研究显示，全球近 90% 的人口对女性仍然持有偏见，这一点在政治与商业上体现得尤为明显。^[4] 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全球化时代，极大地提高了个体生活的便利性。但与数字全球化伴生的也有各种

[1] World Inequality Lab,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2," <https://wid.world/news-article/world-inequality-report-2022/>, 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15 日。

[2] 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 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00 页。

[3]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World Social Report 2020: Inequality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20/02/World-Social-Report2020-FullReport.pdf>, 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25 日。

[4]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Breaking down Gender Biases: Shifting Social Norms Towards Gender Equality," <https://www.undp.org/sites/g/files/zskgke326/files/2023-07/gsnr202303.pdf>, 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23 日。

数字风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数字鸿沟。^①数字鸿沟既体现为人们在网络接入上的差距,也体现为在认知和利用技术上所存在的准确性与有效性差异。在数字全球化时代,这种数字鸿沟催生出一种特殊类型的“新穷人”。^②数字技术的高渗透性使“新穷人”已广泛存在于全球不同地区与国家,成为亟待解决的新的全球不平等问题。

四 推动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的中国努力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追寻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③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明确强调各国互相尊重主权,反对大国干预他国内政。20世纪70年代,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有了更系统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任务。^④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就如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诸多价值理念与实践经验,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重要担当。

(一)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的价值指引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⑤中国积极贡献新的体现人类发展进步的治理理念,为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正确的价值指引。

1. 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国际格局的加速演变,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① 薛晓源、刘兴华:《数字全球化、数字风险与全球数字治理》,载《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3期,第6页。

② 郭忠华、张玉昆:《数字全球化:转捩、动力与后果》,载《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第114—115页。

③ 张宇燕、冯维江:《论全球安全治理秩序的政治哲学基础:公正合理》,载《国家安全研究》,2023年第4期,第7页。

④ 吴志成、吴宇:《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初探》,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22页。

⑤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为人类前途命运指引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为理念指引，旨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理念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当代全球政治理念的基础上，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理念，实现了对传统不公正的美式霸权主义治理的超越，为全球治理变革确立了方向。^①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更加厚实。一是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高度凝练，是中国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智慧贡献，对促进全球治理机制公平合理化改革具有重要指引作用。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实践经验，习近平对义利关系进行创新性诠释，为统筹理解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中国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中国人民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②对重大关系提供了方向指引。^③三是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亲诚惠容理念为指导，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与经贸往来持续加深，伙伴关系网络不断扩大，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2.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数个世纪以来，构建何种国际关系始终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对这一问题做出创造性探索与回答。新型国际关系的要义体现了中国的价值期待。首先，相互尊重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前提。作为国家间交往的重要原则，相互尊重坚持各国主权平等，反对各类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径。相互尊重也意味着尊重不同的制度安排与发展道路。世界因多样而精彩，客观认识人类文明的丰富性以及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推动多元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有利于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其次，公平正义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价值准则。“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公平正义还远远没有实现。”^④为此，中国致力于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一方面，面对各类全球性问题与挑战，中国主张“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⑤另一方面，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坚定一员，中国始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捍卫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集体权益。最后，合作共赢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

① 吴志成、李作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第11—33页。

② 吴志成、李作轩：《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正确义利观》，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3期，第23页。

③ 《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在巴西国会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

④ 《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在巴西国会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

心。“合作共赢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①不同于传统国际关系中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零和思维，新型国际关系强调个体国家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的有效结合，致力于寻求各方共同利益的最大汇合点，实现各国交往关系的双赢、多赢与共赢。

3. 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以何种原则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成为新时代考验各国治理智慧的关键。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②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成为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指引着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过程。“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③共商就是在全世界治理的各项事务上尊重各国平等地位，听取各方合理意见，通过对话沟通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共建是在合作过程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行动者，充分发掘和发挥不同行动者的发展潜力与比较优势，最大程度调动发展力量，获取合作的最大成效；共享意味着发展成果不是为少数人、少数国家所占有，而是所有参与者都能有所收益，体现了包容普惠的发展理念。共商强调起点平等，共建突出过程合作，共享重在结果同当。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理念存在严密的逻辑联系，三者以“共”字为关键核心价值，以互嵌的逻辑、互构的内容、互济的体系构成一个层次清晰的理论体系。^④这一新型全球治理观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开放包容和公平公正，^⑤与传统的主要致力于维护自身霸权利益的霸权式治理形成鲜明对比。

4. 提出和践行三大全球倡议

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使得全球治理赤字更加突显，中国提出一系列全球倡议，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一是全球发展倡议。面对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世界经济恢复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这一倡议强调坚持发展优先，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多边发展合作进程协同增效，加

①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2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41页。

④ 朱旭：《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立论基础、内在逻辑与实践原则》，载《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2期，第16页。

⑤ 秦亚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2期，第1页。

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和促进人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普惠包容，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通过缓债与发展援助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面临较大困难的脆弱国家，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创新驱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携手实现跨越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坚持行动导向，加大发展资源投入，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1]

二是全球安全倡议。“当前，冷战思维阴魂不散，地缘政治形势严峻。各国人民都期盼良好的安全环境，”^[2] 全球安全倡议呼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3] 以上几个方面彼此联系、相互呼应，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2023 年，中国政府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进一步阐明全球安全领域的重点合作方向以及具体合作平台与机制，^[4] 为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的具体落实指明了方向。

三是全球文明倡议。这一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 468—471 页。

[2] 习近平：《团结协作促发展 切下担当促和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3 年 8 月 24 日。

[3]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2 日。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302/20230221_11028322.shtml，访问时间：2023 年 10 月 7 日。

越文明优越。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1]

(二)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凝聚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的合力

全球治理中的多边主义以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开放包容、遵规守制及合作共赢为基本价值遵循,^[2]协调各国集体行动,为全球问题寻求最优解决方案。“多边主义践行得好一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就会解决得好一点。”^[3]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1.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

“多边机构是践行多边主义的平台,也是维护多边主义的基本框架,其权威性和有效性理应得到维护。”^[4]自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始终维护联合国的权威与地位,不断加强同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的合作与交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联合国各个活动领域积极做出表率。首先,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数十年来,中国选派维和官兵5万余人,维和足迹遍及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出兵最多的国家。^[5]其次,中国为联合国项目大力提供资金支持。2020年,“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第三期设立,中国再次捐资5000万美元。截至2021年,中国累计为“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提供1.2亿美元资金,助力发起112个合作项目。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倡议,为国际疫情合作提供5000万美元资金援助。^[6]最后,中国深入参与各类国际条约的

[1]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

[2] 吴志成、刘瑛东:《促进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9期,第29页。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428页。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462页。

[5] 《外交部发言人:中国“蓝盔”成为联合国维护和平的美耀力量》,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5月31日。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件》, https://www.fmprc.gov.cn/qjwb_673085/rbxgk_674865/gkqnlb/tywj/zwj/202110/120211027_10283542.s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8日。

谈判与制定。中国当前已成为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成员，并参加了600多项国际条约。^① 相较之下，美国则多次退出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并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影响联合国合法权威。在全球安全、经济、卫生和气候变化等治理领域，中国都是联合国的忠实合作伙伴。中国也坚定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核心地位，捍卫自由贸易原则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反对将经贸问题与政治挂钩，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2. 促进现有多边治理机制变革

现有全球多边机制在有效性、代表性和公平性上的缺陷损害着全球治理的公正合理性。作为最具发展活力的新兴国家，中国积极承担改革责任，将推进多边机制的公正化、合理化作为自身全球治理的重要目标。首先，中国着力促进提升现有多边机制的有效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倡议并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以此提高全球进出口贸易的透明度与便捷性、降低全球贸易成本，^② 增强世界贸易组织的监管能力。中国有关二十国集团定期召开贸易部长会议和建立贸易投资工作组的提议获得其他成员方支持并形成固定机制，有力强化了二十国集团在贸易投资领域的执行能力。^③ 其次，中国不断推动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多边机制中的代表性。在中国等国推动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提高了3.13个百分点，整体投票权达47.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比重也实现了由代表性过高成员方向代表性不足成员方的转移。^④ 2023年9月，外交部发布《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支持对联合国进行必要合理改革，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⑤ 最后，中国呼吁增强全球多边机制的公平性。一方面助推世贸组织规则的公平性改革，强调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应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纠正现有贸易规则中的发展赤字，增强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包容性；^⑥ 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关键议题上突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性，如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基石地位，强调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的特殊性

① 王毅：《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 高举真正多边主义火炬》，载《学习时报》，2021年7月9日。

② 江小平：《WTO〈贸易便利化协定〉：在中国的实施及展望》，载《国际经济合作》，2021年第2期，第18—19页。

③ 刘宏松：《二十国集团的功能拓展、议题设置与中国角色》，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12期，第8页。

④ 张蕴岭、任婧婧：《中国对外关系：1978—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7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https://www.mfa.gov.cn/wjbcw_new/202309/t20230913_11142009.shtml，访问时间：2023年12月23日。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http://images.mofcom.gov.cn/sms/201905/20190524100740211.pdf>，访问时间：2023年9月28日。

和发展能力的有限性。

3. 创设多边治理新机制新平台

随着全球性议题日渐交织，全球性风险日益上升，中国在维护既有合理机制权威性、促进不合理机制变革的同时，也致力于创设新的多边合作机制。首先是创建经济合作平台。早在2001年，中国发起创设博鳌亚洲论坛，旨在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建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极大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其次是在区域安全机制建设上贡献力量。在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基础上，中国倡导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的合作。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功能进一步扩展，成员国数量增至9个，在地区及全球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成立以来，四国不断深化合作与交流，推动机制由联合巡逻执法向外延伸，目前涵盖联合扫毒、政治交流、实战演习和疫情防控等领域，成为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成功典范。最后是建设多样化的伙伴合作关系。中国的伙伴关系实践已涵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创了国家间交往合作的新模式，丰富了当代多边主义实践的理论内涵。^[1]基于多边主义原则，中国同非洲、南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国家、阿拉伯世界以及太平洋岛国等建立了广泛的合作论坛，共同促进多边合作。

(三)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树立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的成功典范

近年来，世界经济下行，权力政治回潮，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面临巨大不确定性。中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以多边主义凝聚发展共识，将自身理念化为具体行动，为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树立了可资借鉴的典范。

1. 以先进治理理念为指引

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诸多先进治理理念。一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治理的公正化与发展成果的普惠化。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尊重共建国家发展水平差异与历史文化传统，在自愿参与的基础上，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与互利共赢的目标，积极联动共建国家及地区的发展战略与各方行动主体，最大程度地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发展合力。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此后进一步发展为全球治理观的基本内涵，指引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过程。二是开放绿色廉洁理念。

[1] 黄泳：《伙伴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新路径——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伙伴关系实践为例》，载《外交评论》，2023年第5期，第49页。

共建“一带一路”奉行开放本色，以开放胸襟欢迎一切有发展兴趣的国家参与进来，协同合作，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坚守绿色底色，尊重共建各国绿色发展的权利，响应世界可持续发展目标，协力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更加持续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擦亮廉洁亮色，推动完善反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反腐败法律对接，促进反腐败合作，让一切合作在阳光下运行。三是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目标。这三大目标以实现高标准强化共建质量，以追求可持续提升共建韧性，以促进惠民生践行共建初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可以说，共建“一带一路”从理念到原则再到目标和行动，体现了中国对传统全球治理实践中排他性、歧视性、不可持续性不平衡性要素的批判与超越，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的生动写照。

2. 以公正合理发展为导向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促进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的伟大探索。一是为全球发展提供新契机。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缩减南北发展差距。“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通过设施联通获得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同时，也获得了先进技术与经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发出灵活多样的融资方案，帮助解决发展中国家融资难问题。另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缓解共建国家的国内发展差距。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可使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在南亚，巴基斯坦将有11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孟加拉国将有2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在非洲，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将分别降低1.0%和0.9%。^①二是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新动能。在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博弈等多重因素冲击下，经济全球化动能更加不足。共建“一带一路”以“五通”建设为主轴，提升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互联互通性，释放经济发展潜能，为推动新型全球化创造有利条件。这种新型全球化强调以互联互通打通“边缘地带”，使其成长为拥有自我发展能力的“自中心”，从而在全球网络中形成一种“多中心相互促进的结构”。^②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得以共享中国的发展红利，拥有更好的发展机遇，从而缓解传统全球治理中的南方发展不充分和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

3. 以多领域有效实践为支撑

共建“一带一路”具有坚实的多领域实践基础。一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

① World Bank, “Belt and Road Economic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ransport Corridors,”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715511560787699851/ppl/Main-Report.pdf>,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2日。

② 赵磊：《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点与影响》，载《当代世界》，2021年第2期，第45页。

“硬联通”。基础设施是国家间合作的重要基础,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十余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在“陆海天网”多领域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为促进各国经贸往来与人员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仅中央企业就累计承担200多个基础设施项目,马普托跨海大桥、雅万高铁与比雷埃夫斯港等一批项目接连投入使用。^①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倡议设施联通建设的标志性项目,开通十年累计开行7.8万列,运送货物超过740万标箱,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7个城市。^②二是强调规则标准的“软联通”。面对部分发达国家为一己私利挑起“规则之争”,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规则标准的对接,力促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与更大程度的共赢。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已经同共建国家的65个国家标准化机构及相关国际组织就航空、气候、农业和物流等问题签署了107份标准化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标准信息平台稳步推进,标准化概况信息目前已包含149个共建国家,有能力提供59个国家、6个标准化组织的标准信息检索服务。^③三是共建国家人民的“心联通”。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环节,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汉语桥”夏令营项目至今已邀请共建国家近5万名青少年来华访学,并支持100多个国家的10万余名中文爱好者线上学习中文。“鲁班工坊”开设超过70个专业,累计招生3.7万余人,帮助培训外方专业教师4000余人。^④由此可见,与传统国际合作模式下的制度先行或承诺先行不同,共建“一带一路”突出项目先行、软硬联通结合,走出了一条国家之间在公平合理基础上开展合作的新路径。

(四) 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的国家基础

全球化的深化使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呈现出更强的依存性、渗透性与互动性,^⑤良好的国内治理成为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的前提。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夯实强大的国家基础。

① 《中国企业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五个合作项目十年繁荣之路》,载《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2日。

② 《从八个维度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1017/c458064-40097138.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2月24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 http://www.news.cn/2023-10/10/c_1129907870.htm,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28日。

④ 李萍:《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写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载《中国教育报》,2023年10月17日。

⑤ 蔡拓:《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当代中国两大战略考量》,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8页。

1. 提供可资借鉴的国家现代化经验

现代化与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等直接关联，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奋斗目标。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各国现代化主要可以归纳出两条代表性道路：一条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原发现代化”，另一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代表的“后发现代化”。^①前者遵循资本逻辑，坚持资本中心立场，忽视人的主体价值；后者遵循人本逻辑，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个体全面自由发展。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将自身意识形态和治理模式标榜为普遍性现代化模式，并加以强行推广，拒斥非西方现代化路径。但历史与实践证明，世界各国国情千差万别，西方发展模式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非西方国家完全可能开辟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新兴发展大国在长期历史探索中形成的既具备各国现代化一般共性又兼具自身国情特殊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对既有现代化发展道路科学内涵与实践方略的极大丰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②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领导力与道路性质的权威表述，也点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本质不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为其他后发国家提供了现代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增添了新动力。

2. 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各国共同富裕

贫富差距长期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一直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进程。这一难题经常引发民众抗议与社会动荡，威胁地区稳定与全球治理的公正合理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推动发展成果共享，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了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目标。在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各项举措与行动中，消除贫困最具代表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精准扶贫重要思想，并将脱贫攻坚置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不但实现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而且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显著提升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程度。2013—2020年，中国共同富裕指数由24.67跃升至44.23，增长了79.3个百分点。共同富裕指数下的经济发展指数、社会结构指数、居民收入与财产指数、公共产品可及性指数、人民生活质量指数、收入分配公平度指数以及生命健康指数分别提高了90.4%、297.9%、208.4%、28.3%、32.1%、17.2%和107.1%。^③中国共

① 赵义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第47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2页。

③ 韩保江、高程推：《中国共同富裕研究报告（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5页。

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①明确了下一阶段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再次彰显出中国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坚定决心。中国消减贫困的实践为全球反贫困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也有益于其他国家学习借鉴。

3. 坚持走独立自主、合作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改革开放后，中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论断，在此基础上宣布100万裁军与推动核不扩散，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进入21世纪，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先后被写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2018年3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又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由此可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自身传统与社会制度使然，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和”文化源远流长，“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处事原则始终指导着中国的对外交往，侵略他人、称王称霸不符合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是肩负崇高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制度，主张和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③另一方面，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世界发展大势和人类进步方向。当前，地缘政治与权力政治回潮，地区冲突频发，全球和平赤字加重，但这并未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也没有改变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大潮流。实践证明，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和平发展道路是造福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共赢之路。

五 结论

循道而行，方能致远。置身于人类历史发展长河，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趋势，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

②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

③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载《人民日报》，2023年2月14日。

可以发现，公正合理的美好社会始终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就是新时代国际社会努力实现这一愿景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实际行动，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要求改革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方面的共同期盼。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不仅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了全球治理的前进方向，也彰显了中国外交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了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

当今世界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性风险与挑战日益复杂严峻，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任务更加紧迫。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人类所处的既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面向世界历史新的征程，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的历史进程也不会改变，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同国际社会携手前行，坚持公正合理的历史进步方向，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截稿：2024年1月 责任编辑：郭 泉)